

# 徽州文化对新安医学固本培元派形成的影响\*

黄莉<sup>1</sup> 黄辉<sup>1,2</sup> 郭锦晨<sup>1,2</sup> 谭辉<sup>1</sup>

1 安徽中医药大学 (安徽合肥 230012)

2 新安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安徽合肥 230038)

**摘要:**作为古代徽州社会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结晶,徽州文化在数千年中华文化长河中始终闪烁着熠熠光辉。新安医学作为徽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凝结了新安医家经年累月的学术及临床经验,新安固本培元学说的提出是为扭转时弊,以纠正时医治病大队滥用苦寒之品进行攻伐。文章主要叙述在程朱理学、皖派朴学、徽州道教、佛教等徽州文化影响下,新安固本培元派的形成与发展及其代表性医家对固本培元派的贡献。

**关键词:**徽州文化;新安医学;固本培元;形成;价值

中图分类号:R-012 文献标识码:B

DOI:10.16690/j.cnki.1007-9203.2025.19.094

新安医学是指在中国医学史上以安徽歙县及其周围等 6 个县所辖地区的皖南徽州地区为核心,形成的地域性、综合性的医学。新安医学之所以能持续不断进步,一次次地进行学术革新,全赖徽州文化在背后提供支撑,源源不断地输送动力。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山水一方医”,一方地域文化培育与成就了一代人。作为新安医学根植的土壤,广博、深邃、繁荣的徽州文化滋养了新安医学的发展<sup>[1]</sup>。在世医滥用苦寒攻伐及昌盛的徽州文化背景下,新安医学固本培元派应运而生,并发展成为新安医学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并由此诞生了以汪机为首的一系列著名的新安固本培元派医家,如元阴元阳之罗周彦、扶阳抑阴之汪文绮、解托补托之吴澄等。

## 1 徽州文化的形成、内涵及价值

徽州文化的形成最早可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的古徽州地区,据史料记载,徽州地区先后隶属于当时的吴、越、楚地。西晋统一后,“新都郡”改称“新安郡”,徽州地区始得“新安”之名。徽州地区原有的山越文化在经历了永嘉之乱、安史之乱、靖康之变三次人口南迁后,接受了中原正统的儒家文化的熏陶,最终融合成独具地方特色的徽州文化,徽文化发展自此初见雏形<sup>[2]</sup>。东晋建立后带来了中原儒家文化,所以徽州文化从本质上讲属于儒家文化。南宋之后,徽州文化全面兴起,成儒家文化新的发展阶段——程朱理学,根植于传统徽州文化沃土中的宋明理学,作为中国古代哲学的一部分,不仅对徽派朴学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条件,更是对新安医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明清徽商崛起,徽商的脚步遍及全国各地,影响力日趋扩大,为徽州文化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徽州的宗族制度,不仅强化了族人的凝聚力,同时也使得徽州地区的文化发展和学术传承呈现出家门化的特点。

徽州自古文风昌盛,文豪墨客才人辈出,书院林立,历代科举名仕数不胜数,地区文化氛围浓厚。就其文化核心而言,徽州文化还是体现“修齐治平”的儒家文化特质和气质,非常重视个人的修养。为医者,追求仁义,常怀济世之心救人;为商者,追求诚信,常感“信”乃商人之本;为官者,追求忠孝,常以清正廉明安邦。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医学术得以顺利发展的重要推助力<sup>[3]</sup>。作为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正是徽州文化孕育滋养了新安医学,新安医家是徽州文化的熏陶受益者,更是文化的引领创造者。

程朱理学理论提出,先有“内圣”,而后“外王”,个人要想谋求更好的发展,实现人生理想,首先应该提升道德修养和自身素质,时刻内省以保持高度的道德自觉性。格物致知是修身的基础,而意诚是修身的关键,所以徽州文化从个人修养层面来看有助培养个人自律、诚信的道德品格<sup>[4]</sup>。徽州文化中还蕴含着经济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精神价值,如徽州三雕雕刻匠人高超的技艺正如我们现在所倡导的“工匠精神”,徽商贾而好儒,以诚实取信、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公平交易,言无二价、勤俭敬业、吃苦耐劳、开拓拼搏的“徽骆驼精神”亦对当代中国的经济理念和活动有较好的借鉴作用。

## 2 徽州文化背景下新安固本培元派的形成

新安医学固本培元派的形成发展得益于天时、地利与人和,是古徽州自然、历史、政治、文教、经济诸多因素集聚催化的结果。所谓“天下明医出在新安”,盖源于博大精深的徽文化的滋养。

### 2.1 程朱理学提供了固本培元法形成的哲学基础

程朱理学是以宋代程颢、程颐初创,经杨时、罗从彦、李侗等人二传三传,朱熹为集大成者的哲学流派,又称“程朱学派”,是

\* 基金项目:安徽中医药大学 2021 年人文社科重点项目(项目编号:2021rwzd22);安徽省中医药管理局重点专项(项目编号:皖卫中医药发〔2020〕2 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高水平中医药重点学科建设项目(项目编号:国中医药人教函〔2022〕226 号)。

各理学派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流派之一。程朱理学的理论核心在于将抽象存在的精神性实体,强调“理一分殊”——世间万物皆有其理。汪机是新安固本培元派的创始人之一,其在学术上私淑朱丹溪,而朱丹溪则师从朱熹四传门生许谦,汪机虽未亲受程朱之教,其理论却处处渗透其理念<sup>[5]</sup>。朱丹溪受程朱理学“格物致知”观点影响,以推寻探究医学的原理来获得诊治疾病的知识经验,遂以《格致余论》为其作命名,并根据程颢“天地阴阳之运升降盈虚”理论提出“阳有余,阴不足”,创立了金元时代的“滋阴学派”。汪机受程朱理学影响在朱氏的观点之上作出了重大创新性发挥,提出“阳有余”是指卫气常有余,“阴不足”是指营气常不足,而成“营卫一气”之说。此外,《朱子语类》所载“天地之间,一气而已”的天地皆可归为一气理论也为汪机“营卫一气论”的形成提供了重要启示。

## 2.2 皖派朴学奠定了固本培元派严谨的学术风格

在程朱理学中发展出来的皖派朴学在新安医学固本培元派发展中亦具有重要地位。经历了明中后期的系列社会重大变革,一批优秀学者深刻反思,批判否定了理学末流不正之学风。以徽州方回、吴元满等学者为首,开创了皖派朴学,亦称“徽派朴学”,将注重考证、严谨求实的精神广泛应用到音韵、训诂、典制、经学、哲学、天文、地理、历算等各个学科领域。新安固本培元派医家同样十分注意训诂考据,其严谨的学术风格正是由皖派朴学所奠定<sup>[6]</sup>。如新安医家孙一奎求真务实的分析考证和字斟句酌的训诂精神在《赤水玄珠·序》可窥见一斑:“悟其义,会其理……阐发《素》《难》之奥秘,猎戈诸先哲之名言”。此外,新安固本培元医家罗周彦亦是如此,其校注《素问·举痛论篇》:“百病生于气”,由此阐发出“元气空虚致生百病”之名论,提出病发之根源皆可归于一个“虚”字,并强调论治诸病要以补益亏虚之元气为中心。如以上二者,不胜枚举,固本培元派医家与皖派朴学家求真务实、严谨治学的态度一脉相承,阐发了一系列发人深省的真知灼见,极大地丰富了新安固本培元派理体系。

## 2.3 佛道文化氛围充实了固本培元派形成的文化基础

我国历来就有“医道相通”之说,新安医学更是博采众长,以“儒学为魂、道学为体、释学为用”。新安地区道观众多,道家人文与儒、佛亦多有交流,而道教贵阳,重视保真保元。孙一奎故里休宁即有“中国四大道教名山”之一的齐云山,齐云山自唐宋始开山建道,明洪武、嘉靖年间尤为鼎盛。道文化融会于新安固本培元学术思想传承体系之中,成为固本培元法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文化基础。而固本培元学术思想形成时期的三位代表医家汪机、孙一奎、徐春甫均经历了明嘉靖时期,当时的统治者尊崇道教的政治背景亦是新安医学固本培元派形成的重要条件之一<sup>[7]</sup>。“天地成于元气”,“元气”一词最早记载于道家著作《鹖冠子》。最初指构成天地万物的本源,后道家将“元气”代表意义进一步扩充,北宋张君房《元气论》有云:“夫人之受天地元气,始因父精母血”,张氏认为元气为生命之源,是脏腑经脉之根本所系,道文化中“元气”更接近于中医学对人体元气的阐发。孙一奎的医学思想也受《抱朴子》《道德经》等道教经典著作的熏陶,《赤水玄珠》还专辟“方外还丹”一篇论述道教养生思想,孙氏注重温补下元的固本培元思想也受当世炼丹修炼之风的影响。

徽州地区佛教寺院众多,以歙县天宁万寿寺为最,万寿寺与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的九华山一衣带水,交流甚密。新安医家与僧侣两者联系甚密,许多医家身兼僧侣与医者双重身份,如

新安名医程林亦是佛教僧人,其号为“静观居士”。新安休宁孙文胤所著《伤寒捷径书》中述医佛之道息息相通:“不通佛法,不知四悉檀因,未可以言能医也”,且孙氏养生观中亦处处渗透着佛教理论,倡导“神重于形”,注重调神的学术思想侧面映照了佛教“神识不灭”的观点,其“远色慎劳”“调息守口”“节制饮食”等观念治与佛家有关概念相合。

## 3 徽州文化背景下新安固本培元派的学术特色

汉末以来,随着人口迁徙,徽州地区山越文化与中原文化也在不断地交织与融合。山越文化对徽州人影响深刻,塑造了徽州人刚正、义气的区域性格。实际上,无论是崛起于宋代的徽州士大夫群体,还是明清时期的徽商、新安医家,其为人处世都透着一股刚劲,敢想敢拼,敢为天下先,固本培元派就是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孕育而生。

彼时金元新说竞兴,刘完素处于风土刚燥的北方地区,该地区阳热体质居民较多,故《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多喜用温燥之品,河间学派为纠偏滥用《局方》香燥药物的不良风气,提倡药用寒凉,然而“苦寒以伐真阳”,如内伤杂病由苦寒煎熬,渐成虚寒,寒凉过用大有矫枉过正之势。另一方面,朱丹溪滋阴降火一法“印定后人耳目”后,苦寒伤阳比较普遍。而新安所处江南地区多为山岚水湿,所居之人较易受寒湿之邪的侵袭,却多有因病误治而反受阴寒伤害,往往“治虚损者少,做虚损者多”,为补救苦寒时弊,必须使用“参芪”回元、“姜附”救逆,“实出于不得已也”。通过大量临证实践,新安医家也确实发现养元、培元、护元、保元,在强健人体正气、抵御外邪侵袭、促进疾病向愈、延缓机体衰老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以“参芪”温煦全身,鼓舞气血,扶阳益阴,扶正祛邪,用之于临床每有效验<sup>[8]</sup>。明清新安儒医尊奉程朱理学,秉持格物致知的思维传统,以穷理明道为本务,“推求阐发”“驳正发明”,不断地融会贯通、引申发明、推演深化、总结归纳,提出了动气命门、脾胃元气等不少新名词概念,固本培元、养阴清润等系列创新学说,不仅为中华传统哲学提供了实践基础和实际证明,而且充入了实用价值的内容,赋予了生命科学的内涵和生命力,形成了富有科技文化内核的特色学术体系。

### 3.1 甘温补气 重视脾胃

(1)汪机。新安医家汪机及其弟子门生以“参芪”补气,拉开了固本培元法登上医学舞台的帷幕,后世医家纷纷效仿,固本培元派日益壮大,成为新安医学流派中历史悠久、体量宏大、特色鲜明、影响深远的一支。汪氏重视脾胃,但又不采纳东垣升阳辛散的治则,《医学原理·内伤门》载“若饮食失节,脾气内乏”,脏腑不得气血滋养则生内伤之病,治法当以补气为主,治所挟之他邪为标。汪氏也继承了丹溪养阴的观点,却在其上有所发展,不局限于养阴而泄火的治法,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调养气血,培护元气”的学术理论<sup>[9]</sup>。且汪氏认为若论气血言,则血依附于气,“是以气升血升,气降血降,气寒血寒,气热血热”,二者密切相系,是为一气。

(2)吴楚。吴楚继承高祖吴正伦、叔祖吴崑等温补学术,从“行春夏之令”论甘温益气血之法,他认为甘温之方药如同行春夏之令,促使万物生长,直言温补方药如同阳明君子,临证善辨伤寒热真假之证。当时医家不敢用温热药,“一见口渴便云是火”“大苦大寒如黄连、苦参之类,则信手轻投”。吴楚每以温补方药治疗久病不愈、误治生变和急病重证并获效,所著《医验录》就是其纠偏救误的验案专集<sup>[10]</sup>。吴楚私淑李东垣而又有所创

新,认为其脾胃学说详于脾而略于胃,针对脾升胃降之性而提出“脾胃分治说”。

(3)程文圃。程文圃受明代温补名家张景岳影响较深,擅长治疗内伤疑难杂症,喜用人参、白术甘温补气之品,常配伍温热之附子或甘温之熟地黄,或附子与地黄同配。程文圃认为温补之法不仅可用于内伤,而且外感病证亦可运用,重视下元精气同时也重视脾胃气血,立论多取法《景岳全书》,所著《杏轩医案》载内、妇、儿、外诸科医案192则,温补治法占近一半份量<sup>[11]</sup>,以方萃岩翁公郎滑精证治为例,萃翁公郎素来禀赋亏虚,浮火内扰致阳强不密,精自时下,前方仅用六味地黄汤之属壮下元却百日未见起效,程氏在此基础上加龙骨、蒺藜、桑螵蛸等涩精止遗,两旬即见效,后又用参苓白术散补脾胃,水谷精微充足使肾化精得源,程氏将肾中所藏之精喻为钱粮,钱粮藏于库中却非库中自生,需以脾胃输送水谷精微方得充实。

### 3.2 脾肾并治 补益元气

(1)孙一奎。孙一奎自号生生子可见其注重元气之生生不息,其汲取程朱理学的太极自然观之说,并以此为基础提出“命门为肾间动气”的观点,《医旨绪余·命门图说》载:“夫二五真精,结合而凝……名曰动气,又曰元气。”元气为诸气之根本,藏于两肾之间,元气动则为化为肾间动气。此外,孙氏对“命门”的概念亦进行了全新的阐释,提出以命门为动气之所系,三焦为元气之通道,人身阴阳两气之虚需要以补益元气为宗,倡导“生命之运动在于气”,用药多以附、姜、参之类温补元气<sup>[12]</sup>。其所创名方壮元汤专治“下焦元气虚寒”,分析方药组成可知,人参、白术、茯苓补益元气兼以健脾燥湿,桂心、附子、干姜温补下元,砂仁、陈皮运中州气机,全方补肾健脾,益气温阳。

(2)程敬通。清初程敬通糅李东垣补气与朱丹溪养阴为一体,不仅擅长潞党参、头棉芪、山药、芡实等培补脾元,更善甘枸杞、沙苑子、补骨脂等温润以固护肾命,乃古歙槐塘程氏内科医学流派一大“绝活”<sup>[13]</sup>。《程敬通医案》第五十二案中,程氏认为久泻不愈,脉细源于脾肾两脏亏虚。选方不用参、术补土,因土旺制水,更伤肾脏,亦不用地黄补肾,因滋阴助湿,阻碍中焦。选方用补骨脂、吴茱萸、肉果霜补肾中之真阳,辅以益智仁、芡实健脾固涩,脾肾共补,虚湿同治,泄泻乃愈。

### 3.3 扶正祛邪 甘温培补

(1)汪文绮。汪文绮认为:“世人之病百不一实……虚而误攻气散不可救药。”指出“内伤外感之证皆由元气虚弱,致邪气内而发之,外而袭之”,汪氏批判当时医家无论新病久病、“补不效”“表散不应”“外症”抑或是“脉象空虚”,皆以为实证,极少用补法的现象。临证主张先补正气,正旺则脏坚,邪无由而入,善用人参、黄芪、肉桂、附子甘温培补,即使外感百病也以扶正祛邪着手。《杂症会心录》为其数十年行医经验之结晶,书中十之六七皆有人参,用药扶阳抑阴,尤推崇张景岳“温补”,并在“审虚实”篇中明确指出,实证误补尚可救,虚而误攻不可救,疑难重症当从固本培元入手。

(2)吴澄。吴澄著《不居集》一书专论虚损,创“外损说”“脾阴论”,立解托、补托二法。解托、补托法乃专为虚者而设,补托专治外感轻而内伤重,解托专治外感重而内伤轻。解托之法主以柴胡、葛根之“解”,但时时不忘培补元气,“元气一旺……轻轻和解,外邪必渐渐托出”,托则邪气散,解托之法不专于解而更重于托,解托六方均见柴胡、葛根,以柴胡之升拔陷,以葛根之凉清

解托里。补托之法擅治病邪后期正气亏虚,邪气留恋,故治疗主以“补”,故多用人参、黄芪之属扶助正气,同时不忘散邪,所用补托七方亦多含柴胡、葛根。然无论解托、补托、皆处处流露出吴氏重视正气、固护脾胃的思想内涵<sup>[14]</sup>。

### 3.4 阴阳并重 温补培元

(1)郑重光。其于伤寒、温病多有研究,强调阴阳和调,力倡阳气之说,认为阳为阴主,“人之身阳不尽不死,阴不胜不病”,临证主张用附、姜之类温阳益火、温补培元。因痛感时俗恣用苦寒,故专捡“亢害疑似之症”汇成《素圃医案》,选案以阴证居多,议治以温补见长,擅用人参、黄芪,尤多以干姜、附子起病,形成了鲜明的温补培元诊治特色,以卷一伤寒似症案为例,患者虽表现为寒热交替,而观其脉象三脉皆阴,舌虽黑却滑,津液并未耗损,可知该病实为虚寒之证,同时患者已经出现呕哕,躁扰不眠等亡阳之象。故此郑氏一改前人清凉泻热之法,以生附子回阳救逆,干姜助附子温中之效<sup>[15]</sup>,茯苓安神平躁且健运中州,甘草调和兼健脾,全方共奏温中回阳,健脾安神之功,服二剂则神安躁定,四剂后舌苔黑色渐退,六剂后热象而除,八剂呕哕即止。

(2)罗周彦。其《医宗粹言》首分元气为元阴、元阳,又辨先、后天元气。罗氏认为左尺肾水候元阴,而右尺命门火候元阳,“原自下而上生”则为先天元气,“从有形之五行以环运先天阴阳无形之气”则为后天元气,明确提出“元气空虚生百病论”,罗氏认为先天元阳虚损者多精神萎靡,昼重夜安,当用甘温之剂温阳健神,而用补阳药反感烦躁者是因元气亏虚不胜药力,须坚持用药,而后天元阳亏虚多虚实共见,以人参、黄芪、白术配附子、干姜攻补相兼治之。先天元阴虚损亦非一时可治,其病根深蒂固,故用补阴药不愈者是因“功之未到”、“虚之未回”,必须以“百数之药”、岁月之功才可挽回,以当归、地黄、白芍、麦冬等药为核心创立补水益元汤、滋阴益元汤,为先后天元阴虚损之代表方<sup>[16]</sup>。

## 4 结语

固本培元法为新安医学中影响力最大、最具代表性的特色治法,经由诸多医家对其内涵不断丰富与发展,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根深叶茂的新安固本培元派。新安固本培元派的形成,除了与当时的临床医疗环境、主流医学思想有关外,还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与哲学的深刻影响。在徽州文化视野下的新安固本培元派具有璀璨的历史、精辟的理论、实用的临床指导意义,梳理两者之间的关系,不仅能丰富新安医学的科学内涵,还对中医临床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 参考文献

- [1] 刘珍珠,王瑞,代玄烨,等.新安固本培元派形成主要原因探析[J].安徽中医药大学学报,2020,39(1):9—11.
- [2] 李修松.试论汉唐文化在徽文化形成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及其在新时代的意义[J].中国区域文化研究,2021,(2):3—8.
- [3] 张勇,张文徽.徽文化及其时代价值[J].芜湖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2,24(1):30—34.
- [4] 卞利,马德璟.从东南邹鲁、程朱阙里到新安理学:宋元明清时期徽州地域文化认同的建构[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46(1):1—11.
- [5] 张倩,牛淑平.程朱理学对新安医学固本培元派的影响[J].中医学报,2017,32(4):564—566.
- [6] 谭辉,纵艳平,郭锦晨,等.徽派朴学演进视野下新安固本培元派形成与发展[J].中华中医药杂志,2022,37(3):1776—1779.

- [7] 刘珍珠,翟双庆,王瑞,等.道文化对新安医学固本培元法形成的影响[J].中医杂志,2020,61(3):257—260.
- [8] 张佩文,王键,刘兰林,等.基于临床医案分析新安六大医家温补学术思想及辨治特色[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20,6(4):451—454.
- [9] 周超,刘兰林,郭锦晨,等.汪机《石山医案》温补培元学术思想及用药规律探析[J].甘肃中医药大学学报,2017,34(3):20—22.
- [10] 冯烨,刘兰林,罗梦曦,等.新安医家吴楚《吴氏医验录》补中益气法辨治特色[J].长春中医药大学学报,2017,33(1):160—162.
- [11] 杨勤军,汪瑶,郭锦晨,等.从《杏轩医案》浅析程文圃主要学术渊源与临证诊治特色[J].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2015,39(5):416—417,422.
- [12] 孙宇洁,郭锦晨,纵艳平,等.基于《医旨绪余》小议孙一奎
- “宗营卫”三气学术思想特色[J].陕西中医药大学学报,2020,43(5):54—56.
- [13] 吴云霞.《程敬通医案》固本培元思想初探[J].中医药临床杂志,2009,21(1):48.
- [14] 徐雯洁,徐世杰.基于护阴理论的汪机、吴澄、叶天士三家脾胃思想研究[J].中华中医药杂志,2017,32(3):1206—1208.
- [15] 郭锦晨.《素圃医案》“伤寒治效”中四逆汤的应用浅探[J].湖北中医药大学学报,2014,16(1):72—73.
- [16] 孙宇洁,郭锦晨.基于《医宗粹言》探析新安医家罗周彦“元阴门”学术思想[J].中国民族民间医药,2019,28(14):5—7.

(收稿日期:2024—11—22)

作者简介:黄莉,讲师,校图书馆副馆长。研究方向:新安医学。

通讯作者:黄辉,编审,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新安医学。

## 新质生产力驱动下 一院多区中医院文化建设的创新路径

徐峰 陈筑红 李秋艳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 (北京 100091)

**摘要:**随着新质生产力的兴起,一院多区中医院的发展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文章深入探讨新质生产力驱动下一院多区中医院文化建设的创新路径,阐述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及特征,包括技术革命性突破和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分析其与中医药高质量发展的紧密关系,如中医思维与现代科技融合以及科技研发对产业的支撑;剖析一院多区中医院的特点,既具有医疗资源扩容、学科协同发展等优势,又面临学科定位与人才储备难题、中西融合思想落地困难等挑战。新质生产力为中医院文化建设带来智慧医院与文化传播、创新文化与人才培养等新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融合难题、文化建设平衡与协调等新挑战。针对这些影响,提出内部文化建设策略,如形成专项工作机制、塑造医院理念层文化;外部文化传播策略,包括运用新媒体传播和举办特色文化活动。文章旨在为一院多区中医院在新质生产力背景下的文化建设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推动中医药事业的现代化和创新发展。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多院区;中医院;文化建设;路径

中图分类号:R197.4

文献标识码:B

新质生产力在当今时代蓬勃兴起,成为推动各行业发展的力量。2023年2月,《中医药振兴发展重大工程实施方案》提出要“健全中医药协同创新体系,促进中药质量提升和产业高质量发展”<sup>[1]</sup>。在医疗领域,尤其是中医药行业,新质生产力的出现为其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中医药新质生产力新在生产要素、新技术和新模式,从而实现“质”的变化<sup>[2]</sup>。随着社会对医疗服务需求的不断增长,中医院的发展也面临着更高的要求。单体多院区模式逐渐成为中医院发展的新趋势,这种模式能够更好地整合医疗资源,提高服务效率,满足不同地区患者的需求。

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在于科技的先进性、创新性、引领性。对

于中医药行业来说,现代科学技术的革新帮助中医药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华丽转身。例如,中医诊断模型、六经辨证系统、中医脉诊仪、舌诊仪等中医药人工智能已被部分应用于临床。这些先进技术的应用,为中医院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通过探索新质生产力对一院多区中医院文化建设的影响,并提出创新策略。通过深入分析新质生产力在中医院的应用,探讨如何在一院多区的模式下,加强中医院文化建设,提升医院的核心竞争力,以及新质生产力如何影响中医院的医疗服务质量、人才培养、科研创新等方面,同时分析如何通过文化建设,促进一院多区中医院的协同发展,为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